

唐朝“公务员”的“朝九晚五”生活

☐ 刘永加

冬天到了，白天越来越短了，对于上班族来说，尽管如今大城市公务员上班大都实行的是朝九晚五工作制，但还是觉着早上的时间很紧张。

而穿越到大唐的都城长安，那时“公务员”们是如何上班的呢？

不在早朝的路上
就在早朝的马背上

大唐长安的官员们上班要比现在辛苦得多，凡是五品以上的京城官员上班分两部分，第一步是早朝，第二步早朝后再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开始工作。所谓早朝就是到皇上去朝见皇帝，与皇帝面对面地当场议决政事的办公形式。

那时的早朝的确很早，五更天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三、四点钟，京官们就要起床，赶往皇宫参加早朝。那时没有时钟，又起床这么早，为了不误点，以前由更夫传递信息，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一站接着一站地在大街上高声叫喊，到了该上朝的官员府门前就特别地通知守门人员，让他们进去通报时间到了，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为“鸡人报晓”。更夫素有“鸡人”的雅称。但是，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弊端很多，一方面影响市民休息，另一方面也未必准确，常常误了京官们的早朝。到了唐太宗贞观后期，宰相马周想出了一个替代的办法，即在大街上安置一面大鼓，到了报更的时候，更夫就敲响鼓点，如果是一更就敲一下，是五更就敲五下，像现代的车站或海关的报时钟。这种鼓声报时有了很大的进步，人们愿意接受，一起遵守。

为了准确掌握时间，有些官员也是煞费苦心自己想出一些办法。唐玄宗时，宰相裴耀卿养了一只小鸟，到了五更天的时候，它就大声地叫唤起来，而且叫声非常急促，每当听到这样的叫声，裴耀卿就知道该起床早朝去了。这只鸟被称为知更雀。

上朝的官员一般都骑马，由于天气太早黑暗的缘故，一般没有人坐轿子。上朝的官员在路上行走，是比较随便的，到了唐代宗年间，朝廷任命徐宏毅为知弹侍御使，负责上早朝的礼仪纪律纠察。徐宏毅到任后，出台了一个新的措施：他设置一个知班官的职位，率领一队衙卒人员，在从宣政门一直到皇帝上早朝含元殿的路上巡逻，检查上朝官员的礼仪。这种突然措施使大家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官员更是这样做，都表示反对。徐宏毅却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求你们早地做好心理准备，不要在朝班上做出有损皇上威严的事情来。”大家无可奈何，只得遵守。

宰相的午餐很好吃
餐桌却岿然不能动

早朝完毕后，官员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了。宰相们下早朝后则是到自己的办公机关政事堂去工作。宰相们辛苦了一上午，早饭也没吃好，政事堂设立了一个餐厅，宰相们的中餐是由朝廷供给的，由于是宰相们的伙食，所以也就准备得特别丰盛。对此，有人提建议应该节省一些，降低标准，不少朝臣也议论纷纷。宰相张文瓘听说后，坚决地说：“这种伙食是圣上对宰相们工作的一种鼓励，是为了使他们更好地工作。如果认为哪位宰相不称职，尽管让辞职好了。不要提出什么降低伙食标准的问题以邀取虚名。难道我大唐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连宰相们一顿中餐都招待不起吗？”后来，再也没有人议论宰相们的伙食标准了。

宰相们的餐厅里摆着一张长条桌，供宰相们吃饭使用，这张长条桌称为政事床。政事床总是摆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挪动过。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源乾曜同时为相。有一次，姚崇的儿子病了，请了几天没来上班。不知什么原因，恰在这几天，源乾曜将政事床移动了一下，姚崇上班发觉后，十分生气，大声地质问他说：“没有我的允许，你怎么能够在政事堂里乱动乱挪！”当时姚崇是首座宰相，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源乾曜的能力、威信都比不上姚崇，所以也就大气不敢出。

这时，唐玄宗来了，问明原因后，就冷冷地对源乾曜说：“我看你还是辞去宰相职务为好！”就这样，源乾曜被罢了相。姚崇正暗自高兴，谁知第二天也得到命令，被免去了宰相职务。



资料图片

拾遗补缺敢提意见,给事中谁的稿子都敢改

不仅是宰相们的工作繁忙，一般的京官也是各司其职，繁忙有序。其中，中书省掌管制令决策，是中央最高权力机关；门下省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并负责礼仪。这两个部门的官员还都兼具讽谏的职责，专门设立了谏议大夫、拾遗等谏议官职。这些谏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向皇帝提建议，出主意等。

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担任过拾遗官，后来又由拾遗提升为补缺，仍然是谏官。当时正是唐宪宗在位，他大刀阔斧地对大唐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对一些人才的选用。他任用正直的李绛担任宰相，但是对宦官却依然宠信。

有一次，唐宪宗早朝商量讨伐藩镇王承宗之事。宪宗说：“我打算任命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让他统兵前去征剿。”吐突承璀是当时最大的宦官，任神策军中尉。派他当统帅领兵去征剿叛乱的藩镇，显然是不合适的。皇帝提出了人选，而宰相李绛却低下头，不敢作声，

其他宰相也都没反对。

这时，白居易突然站出来，大声地说：“不能任命吐突承璀当招讨使！让一个宦官当统帅，我担心天下藩镇从此轻视朝廷；外国知道了，从此会嘲笑我们中国；王承琮知道后，更增加骄横跋扈之气焰；编修国史的史官们记载下来后，子孙后代脸上也无光！”白居易一席话把唐宪宗给气坏了。唐宪宗认为白居易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如今居然如此极力谏阻，实在是让他忍无可忍，要惩治白居易。

身为宰相的李绹虽然自己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白居易能够站出来主持正义，他自然很佩服，于是就劝唐宪宗，白居易之所以敢冒死犯上，实在是因为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如果因为这件事就要治他的罪，恐怕以后没有人敢说真话了。后来，唐宪宗采纳了白居易的意见，没有任命吐突承璀担任统帅。

门下省最重要的官员是给事中，给事中具有封还诏书、驳回奏章的权力。白居

京官值夜班是常态,宰相却可以例外

京官都有晚上和节日值班的制度。尤其是三省的官员们，必须坚持轮流值班。

夜晚在三省值班，对于一个初入官场的人来说，是一件颇为新鲜有趣的事。大诗人杜甫仕途一直不顺利，除当几个月的左卫率府曹曹参军外，直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四十七岁时才被肃宗授予右拾遗，添居朝官之列。这一天，轮到他值夜班，他是多么兴奋，一会到房外望望月，看看花，一会又坐在屋里听虫叫鸟鸣，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写下了《春宿左省》一诗：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特別規定，凡是在春天夏天晚上值班的翰林學士，都可以領到一些茶果。其他的值班人員，也有不同的照顧。有時值班人員還可以享受到一種特殊恩榮，有一年八月十五晚上，唐玄宗突然召見全體值班人員飲酒賞月，當時蘇頲在翰林院當學士，正巧那天晚上值班，便高興地參加了，他記載了此事。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七月十四日，三省按照惯例放中元假，所有的官员都回家了。早朝退朝后宰相夏侯孜一个人因故呆在政事堂。突然，宫中传出宣宗的命令，任命御史大夫李景让为检校吏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除了几个值班者外，三省空无一人，连负责接待圣旨事务工作的通事舍人也早已回家了。结果，圣旨传出来后，夏侯孜一人接旨，没有人

易曾经评介说，给事中的权力和职责在于，“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截退之。”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不仅需要水平，更需要胆识。

唐德宗贞元年间，李藩当了给事中，有一次，德宗下达一个敕文，是由中书省草拟后经德宗审批同意，然后用皇帝专用的黄麻纸书写后传送到门下省的，恰好交给李藩处理，李藩一看敕文的内容有许多不当之处。于是，他拿起笔来就在黄麻纸上批改。其他同事看了大吃一惊：“这是皇上的圣旨呀！你怎么在上面乱涂乱改？”李藩严肃地说：“你错了！如果我用另一张纸书写我的意见，那就变成我写另一篇奏章文状了，就不能称为批改了。现在，我是给事中，有批改的权力，那么我理所当然是在黄麻纸上批改。如果不在原件上批改，那还叫什批改呢？”大家听了都哑口无言，李藩还是照样去做了。

宰相们重新制定一个节假日的休假制度，从此以后，凡节假日，负责接宣圣旨等事务的通事舍人也必须有人值班。

自唐初开始，宰相也是要值班的，后来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姚崇任宰相，当时，姚崇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又深得玄宗的宠信，地位很高，常常倚老卖老。一次，当主管值班登记工作的办事员拿着轮流值班登记簿找姚崇给他排值班时，姚崇却拒绝了，无奈办事员就去找自己的主管官员，回来对姚崇说：“我们长官说了，没有宰相不值班的制度，也没先例。姚大人还是必须值班！”说完就把登记簿递过来。姚崇想了想，接过登记簿，提起笔来，就在上面写道：

告值令史，遣去又来。
必欲取人，有同司命。